

数字

改善留守儿童情绪状态是关键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发布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2014年10—12月,“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李亦菲,对我国东部、中部、西北、西南的六个省市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从亲子沟通、学业学习、课外生活、情绪状态等方面,反映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与心灵状况,重点关注不同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系统分析地区、性别、学习、生活等因素对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的影响。

本次调查的农村儿童来自我国东部、中部、西北、西南的六个省市农村地区,发放问卷2218份,回收有效问卷2131份(占96%)。从总体上看,“父亲外出”、“母亲外出”、“父母都外出”的三类留守儿童占55.2%,这其中,父母都外出的留守儿童占33.5%。各地区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分布比例存在较大差异。

学校教师对留守儿童并不全部知晓

主办方请教师写出自己所教班级中留守儿童的数量,发现教师所写出的留守儿童的数量只占全部学生的26%,大大低于

根据学生答题所推测的数量。究其原因,可能是学校教师并没有对自己学生的留守状况进行细致的统计,只是关注那些在情绪和行为问题上表现比较突出的儿童。

女性儿童家中母亲外出的可能性较高

值得关注的是,在“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中,女性儿童多于男性儿童(约多出5个百分点,52.7%>47.3%),并且不存在地区差异,即:在女性儿童的家中,母亲外出的可能性较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习俗。在母亲所生孩子为女性的情况下,可能会面临来自家庭及其他各方面的压力,并导致其外出打工,甚至与孩子的父亲离婚而离开家庭的情况。

近七成孩子不知父母做什么工作

69.2%的留守儿童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外所从事的工作,有14.9%的儿童反映自己的父母在私营企业工作,有5.6%的学生反映自己的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

有10.4%的学生反映自己的父母自主创业。

在1054名留守儿童中,有11.1%的学生与父母每月见面3~4次,32.7%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5次以上,11.7%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3~4次,29.4%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1~2次,15.1%的学生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按照留守儿童总数6100万测算,全国约有近1794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有921万孩子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显然,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4.3%的学生一年中从未与父母联系过

1045名留守儿童中,与父母几乎天天联系的学生有23.9%,与父母每周联系2~4次的学生有28.6%,与父母每月联系3~4次的学生有19.3%,与父母每年联系3~4次的学生有10.4%,与父母每年联系1~2次的学生有10.2%,与父母一年都没有联系的学生有4.3%。

按照全国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总数测算,每年与父母联系次数少于3~4次的儿童,在总数上达到惊人的1518万。

母亲外出对留守儿童情绪影响更明显

在“迷茫指数”和“烦乱指数”两个消极情绪变量上,留守儿童的得分均高于非留守儿童。根据这一结果,农村留守儿童的迷茫度和烦乱度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愉悦度和平和度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明显差异。

烦乱指数和迷茫指数方面,母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与父母都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反映出与父亲外出相比,母亲外出对儿童烦乱度、迷茫度的影响更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母亲在为小学阶段儿童提供稳定可靠的生存条件、增进对未来的信心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母亲外出往往伴随着父母离异,而这一事实对儿童的生存条件和未来希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其烦乱度和迷茫度的加剧、愉悦度的减少。

与父母联系的次数对农村儿童烦乱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一年内与父母联系次数越少,儿童的烦乱度越高,与父

母几乎每天联系的儿童烦乱度最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内与父母没有联系的儿童,其烦乱度竟然小于见面次数在每月3~4次、每年3~4次、每年1~2次三种情况。说明长期与父母不联系使得儿童的情绪状态受父母的影响减弱。但其中所蕴含的亲情的缺失可能是更为深刻的,而且是难以弥补的。

本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与非留守儿童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消极情绪方面,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进而,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主要受到学习方面和留守状态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根据这一结果,改善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需要从多个方面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导致困难或挫折的外部突发事件中,个体的不同应对方式对自身情绪状态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在调查中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在困难或挫折情境中的应对方式,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不同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差异,而且可以为改善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提供一个新思路。

他山之石

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谈

●台湾:建立三级保护体系

初级预防:重要教育、民众举报

次级预防:针对高危家庭提供防范服务

第三级:对受虐儿童提供全方位的紧急救援

初级预防是以教育宣传和个案通报为主,旨在从家庭、学校、医疗、警政及邻里等部分着手,预防儿童虐待事件的发生。对儿童提供自我保护的概念和技巧学校,对家庭和大众提供相关培训。

台湾在1973年就通过了《儿童福利法》。经过一系列制度化发展,在2003年形成了《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并设立了113专线,提供民众举报伤害少儿权益案件。

根据《儿童及少年福利法》规定,台湾的医务人员、社工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警察、司法人员及其他执行少儿福利业务人员,在发现少儿受伤害或在限制级场所充当侍应等,必须于24小时内通报主管机关,否则将面临罚款。

而每个县市的113专线都会由数十位专业社工负责,24小时全年无休。接到举报后,如情况紧急,会立即通报警察局通过卫星定位赶往现场。一般情况下,3天内一定会有县市政府主

管部门或社工上门探访。

次级预防以高风险家庭的专业服务为主,是希望在问题的早期征兆发生之时,就可以针对高危人群采取有效的策略。提供个案、小组、社区等服务,建构针对高风险家庭机型筛选转接及关怀体系。

第三级是针对受虐儿童和施虐者提供全方位的紧急救援。通常包含了警政、医疗、儿童保护社工、心理辅导、司法、学校等团队,提供紧急救援、危机预判、保护安置、强制性亲职教育、定期追踪等措施,最终使得暴力终止以及防止暴力在代际间的传递。

●美国:强制报告制度

强制报告:明确报告责任主体

初步审查:多部门联合评估应对快速反应

公布评估结果,服务安置儿童

建立侵害责任人登记制

在美国,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立法中规定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特定人员在发现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时向专门机构报告,并对未能报告的责任主体给予适当的处罚。报告人涵盖范围很广:教师、校长和其他的学校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

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心理医师或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验光师、牙医、安全官员、教士、牧师、基督科学工作者;儿童照料人士;法医或验尸官;法律执行机构人士。还有18个州甚至规定任何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怀疑存在儿童虐待或忽视情形时都有报告的责任。

接到报告之后,受理机构会对报告进行初步审查,对于报告发现的严重或可能涉及犯罪的儿童虐待案件,应当成立一个由警察、检察官、执业医师、虐待评估专家和儿童保护中心职员共同组成的多部门小组,从而能够协助评估报告、调查报告事实和提出咨询建议,这已成为儿童虐待的一种有效应对方式。调查机构应当根据儿童所处的危险程度开展调查,各州法律都对调查的启动时间做出了规定,通常是接到报告后72小时之内,但对于紧急的情况,应当在2小时至24小时内启动。

接下来是评估与公布结论,如果调查表明儿童确实面临虐待的现实危险,就需要对案件继续处理,决定提供家庭支持服务或者安置儿童;会直接将儿童带离家庭送至紧急保护监管机构,并在带离之后的24小时或48小时内向少年法庭申请听证获得保护儿童的授权。

如果法院认定确实存在虐待或忽视且虐待或忽视的威胁持续存在,法官会裁定将儿童迁出并安置在亲属家庭、非亲属寄养家庭或特定的儿童监护机构(如寄养中心、儿童之家、特殊群体之家等)中照料。如果没有发现存在儿童虐待的情形,报告内容“未获证实”或“未获肯定”,则结束案件。

最后,对于轻微的虐待和忽视行为,儿童保护机构会制定服务计划,对父母等照料人进行指导和培训,有时还会与家庭签署协议以避免再次发生虐待或忽视;对于严重的儿童虐待行为,法律执行机构会接手调查甚至对侵害者提出刑事控诉,侵害者可能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另外,无论是否构成刑事责任,只要经证实存在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就会对侵害责任人信息进行数据库登记。

在美国各州的法律中,涉及“危害儿童安全罪”的主要有四类情形:

1.故意虐待,即小到皮肉伤,大到骨折和死亡等人为原因造成的伤害。

2.疏于监护,比如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让大点的未成年孩子照顾弟妹,以及没有为孩子提供必需的居住、饮食、医疗、教育等条件,都属于监护不力的范

围。有报道说曾有一对夫妻为追求个人信仰,带着5个孩子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孩子们自然也就没有出生证,没有上过学,甚至没到医院看过病。但偶然被人发现并举报,父亲被判监禁两年。

3.性侵或性虐待。这显然是比较严重的儿童伤害罪,犯罪者自然是重罪。如果周围人知情不报,或渎职,纵容罪行,也要遭受严厉处罚。

4.心理虐待。这也是不容易被发现,但确实会对孩子造成不同程度伤害,比如给孩子留下伴随一生的心理阴影,导致自卑、孤僻、反社会甚至精神疾病等严重后果。

●印度:留守儿童热线

印度儿童热线基金会开设了24小时免费热线服务,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孩子可以通过拨打“1098儿童热线”向政府部门或民间组织开设的儿童保护机构寻求帮助。该项目为处于困境的儿童特别是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儿童提供住所、医疗服务、心理辅导、遣返和康复等服务,帮助他们免受虐待、遗弃和被忽视。目前,该服务在全国各地的83个城市、城镇开通,与190家援助机构合作,每年有超过两百万的呼叫服务。(高文兴)